

# 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

## ——21世纪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周毅

**摘要** 本文扼要回顾了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历程,阐明衡量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基本要素、测度内容以及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持续圈与行为圈的关系问题。

**作者** 周毅,1963年生,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北京 100871)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但也是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不可持续的经济畸增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发生了三大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迅猛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长,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已成为20世纪四大显性危机。四者的恶性循环为旧工业生产方式掘下了坟墓,今后人类生存发展已不能单凭土地粗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那种“先污染后治理”,不惜以高消耗刺激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发展历程。<sup>[1]</sup>

一、发展理论新走向:从经济增长单学科到可持续发展多学科

发展学初始于18世纪自然科学中的生物胚胎学,继而在19世纪古典经济学中有所提及。但真正的丰富和发展得益于20世纪初叶爱因斯坦、罗素等科学家关于人类生产发展的预言,到20世纪中叶康德拉季耶夫、G·雷诺兹、J·熊彼特的经济发展长波循环论,又到80年代“绿色政治学”取代“强权政治”一跃而为各国绿党的施政纲领和理论基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本世纪末联合国倡导并为各国普遍纳入国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一螺旋式上升历程包含自我完善和自我否定。经过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洗礼,许多国家开始由单纯强调经

济增长转向寻求经济、社会、环境、技术、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倡导发展的协调性、综合性和持续性。这种发展观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想和全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课题。其大趋势是:人与自然协调,自然与生产和谐,生产与消费适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生态文明与市场文明良性运行,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可以说是古代氏族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sup>[2,3]</sup>发展理论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实质上可以将其归纳为两方面:一是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二是从以发展的“客体”为中心到以发展的“主体”为中心的转变。如果说前者是“发展范围”的扩大,那么后者则是发展目标和核心的转变。<sup>[4]</sup>

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发展历程。发展学从发展经济学开始,实为“增长经济学”。在增长经济学盛极一时的50年代末期,发展成了经济学“第一优先的经济议题”,衡量发展的标准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及其增长率。战后西方经济学家没有把“发展(development)”与“增长(growth)”两个概念区别开来,认为“发展=经济增长”。早期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刘易斯、罗斯托等人认为,贫困国家之所以贫困,根本原因就是“经济馅饼不够大,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把馅饼做得大些”。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曾直言不讳地声明:我们的兴趣不在于分析分配,而在于分析增长。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人们关心的只是国民生产

总值的数量,并以此作为衡量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尺度。这种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以联合国规定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为目标,忽视了社会其它领域的发展。联合国“第一个发展10年(1960~1970年)”开始时,秘书长吴丹概括地指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这一广为流行的关于发展的公式,反映了战后头20余年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毫无理性追求经济片面增长带来了一系列日益严峻的“世纪性难题”。其一,这种传统认识导致了人类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粗放式利用。其二,加快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破坏程度,代价惨重,影响人类生存。其三,GNP的增长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反而导致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其四,经济畸增与文明衰落共生。总之,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由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10年(1960~1970年)”宣告失败,促使人们开始对这种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产生怀疑和反思。于是自60年代起,首先是经济学家,然后是生态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等开始审视和反思工业经济中普遍奉行的“不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和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

70年代伊始,围绕罗马俱乐部未来学派提出的“增长的极限”而引起的学术大争论,导致了以发展的“客体”到“主体”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萌创。

“可持续发展”理论在80年代初形成之后,立即得到迅速传播,从生态环境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并成为左右发展决策的强有力理论体系。早在1973年,联合国专门成立了环境规划署(UNEP),1983年又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任命挪威前首相G·H·布伦特兰夫人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要求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领导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并同时委任以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环境委员会和规划署合作编制《环境前景》文件。经过3年多调查研究,该组织向1987年召开的第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多次强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关键概念,同时提出和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了大会确认,从而为促进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接受“可持续发展观”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和辩论,终于在1989年5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署第15

届理事会达成共识,认为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这一共识包含:子孙后代的需要、国家主权、国际公平、自然资源、生态抗压力、环保与发展相结合等重要内容。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再次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经全体联合国成员共同努力,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方针制定并通过了《21世纪议程》和《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会议号召各成员国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并加强合作,以推动《21世纪议程》的落实。正式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详尽而深刻地阐明了环境与发展关系,丰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方案,为人类改善环境、完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前景。此后,联合国还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协调各国执行《21世纪议程》行动,同时还设立了“21世纪能力建设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增强其加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后又在1994年9月于开罗、1995年3月于哥本哈根、1995年9月和1997年10月于北京先后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及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世界第四次妇女大会和国际人口会议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可持续发展终于成为世纪转换之际最重要的命题和各国尤其是重大国际会议关注的焦点。同时可持续发展亦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80年代中期至今,“可持续发展”逐步完善为系统观念和系统理论,并上升到全人类迈向21世纪的共同发展战略而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和推行。

## 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测度和操作

宋健在1996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撰文谈到“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时指出,它的目标是保证社会具有长时期可持续发展能力,要点是:其一,发展内涵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和保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应包含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两部分。数量增长有限度,而依靠科技进步去提高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才是可以持续的。其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可持续发展主要依赖于可再生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的永续性。协调自然生态环境,维护全球生命支持体系,保护生物多样性。其三,自然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有如空气和水一样,是人类生存和进步须臾不离的东西。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它应朝着更加均衡、和谐、互补的方向进化,具有不可递性、广泛性和关联到自然—社会—经济的复杂性,是一种正向的和有益的过程,因而它可望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和不同的进化阶段上,作为一个标准去诊断、核查和仲裁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健康程度”。因此,可持续发展社会应具备5个特征:第一,可持续发展社会把人看作是自然界一部分,强调人虽是万物之灵,但必须与自然界保持协调。正视人类社会是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体,其核心思想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等要素应相互协调、和谐发展,实现良性循环,而不能顾此失彼。第二,它不是以经济发展为统一目标,而是强调包括社会和自然环境在内的多因素共同发展。这些发展都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为主旨,即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第三,可持续发展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把自己与客观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不断地实现着与客观环境的物质、信息及能量的交换。因此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第四,可持续发展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变迁过程,因此,它的各个构成因素正是处在动态的协调之中。第五,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需要人们拿出勇气去转变自己的唯物质价值观,树立人类社会整体观和地球责任感,变“浪费型生活方式”为“节约型生活方式”。可持续发展是内涵型、质量型的发展,是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人类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存环境的发展,而不是外延型、数量型或粗放型发展。由此看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高层次发展,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文明观。<sup>[5]</sup>

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 判断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高低,可由5个基本要素衡量。其一,资源承载能力。通常被称为“生存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按人均资源数量,以及它对于该空间内人口基本生存的支撑能力。如果考虑资源世代分配问题,则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如不能满足,可以挖掘替代资源,务求“生存支撑系统”保持在区域人口需求范围之上。其二,区域生产能力。通常被称为发展支持系统或福利支持系统。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的总水平,可以转化为人

的不断增长需求及物质能量水平。要求此种生产能力在不危及其它子系统的前提下,必须与人的需求同步增长。其三,环境缓冲能力。通常被称为“环境支持系统”。人们对区域开发、资源应用、生产发展、废物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的允许容量之内,否则,发展将不可能持续。其四,进程稳定能力。通常被称之为“过程支持系统”。在整个发展轨迹上,不允许出现由于自然波动和经济社会波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避免系统出现崩溃状态,或出现不可逆的后果。这里有两个途径可以选择。一是培植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二是增强系统的弹性,一旦受到干扰后恢复能力应当是强的,有迅速的系统重建能力。其五,管理调节能力。通常被称为“智力支持系统”。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和调节能力应适应于总体发展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袁方教授在1996年第二届亚洲社会学大会交流的学术论文中拟定了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考核社会反映能力。他将其归为十大指标。其一,社会稳定度。主要用于衡量社会有序的保持能力。此种稳定不是一般意义下的社会运行,而是真实地体现安居乐业的主动感受。其二,社会安全度。主要表现为社会守法的自控能力。此种安全的最低标准是减少犯罪和暴力,最高标准是组成社会的人的道德约束。其三,社会保障度。体现了社会福利的支配能力。对于失业、养老、保障、医疗卫生、教育设施、文化娱乐等社会保险程度,是可持续发展的福利体现。其四,社会舒适度。可持续发展意义下所带来的环境净化能力,人们生活起居和工作学习的环境,应能提供某种清新、愉悦和促进身心健康的功能。其五,社会公益度。是社会中的自助互助能力。它已将可持续发展下的物质利益和环境利益扩大到人的精神层次和道德层次。其六,社会抗逆度。是整个社会自救互救能力。在突然灾害袭来时,如何体现社会抗逆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是检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其七,社会满意度。是指社会准则的认识能力。其八,社会文明度。社会公德的约束能力。其九,社会控制度。它是社会管理公共能力的体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除平行关系外,对于等级和有序维持水平,是社会控制度的标志。其十,社会自立度。理解为社会恢复重建能力。

可持续发展的操作 可持续发展理论把当代人

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及其局部区域,看成是由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因素组成的复合系统。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其相互作用因地而异,且处于变化之中。这种系统论的观点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并为人类与自然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整体框架。<sup>[6]</sup>

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中,中心矛盾是持续圈与“行为圈”的关系问题。由于资源条件或技术条件的限制,人类可利用的持续圈总是有限的。所谓“行为圈”,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或其他需要,在技术和行为上所达到的需求或使用自然资源的集合。对于人类可用的持续圈,一般情况下会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而逐步扩大。但是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人类可用的持续圈也有可能随着人类自身行为圈的扩大而产生缩小的趋势。比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会使生物物种灭绝,从而使人类永远丧失对某种生物物种利用的可能性,意味着人类可用持续圈的缩小。对于人类的行为圈来说,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但是从长期的发展运动和过程看,却总是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随着人类需求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人类行为圈也会逐步接近其可用的持续圈。如果人类的活动一方面使得自身行为圈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却又使得自身可用的持续圈逐步缩小,就会形成一种相当危险的局面。生态危机,正是指人类行为圈接近或超过人类可用持续圈时所呈现的状态。而这种发展方式如不改变,我们便把它视为非可持续发展方式。当人类行为圈逐步接近于人类可用的持续圈时,人类社会发展的危险性也在逐步加大,非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便逐步增强。但是不能说,行为圈与持续圈的比值越低越好。从社会发展史角度来说,人类是作为大自然逐渐演变的结果而出现的,演变的实质是使得人类可用持续圈的稳定系数增大,其自由能量增加。这是因为,生态危机和自然灾害是地球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人类行为圈的出现,使大自然启动了维持持续圈稳定的新机制。大自然给人类以智慧,以防出现可能的不利局面。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认为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的稳定系数是更大的则是一种错误认识。于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便提出来了。这就使得人类可用的持续圈不但在今天大于人类行为圈,而且也能够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大于人类行为圈。当然,这种格局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接近越好,而要根据经验和理论测算,找出一个最恰当的比值,

即X值。从理论上说,X值可以取从0到1任意一值。这个数值选择得恰当,人类可用的持续圈就会优化。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理论为人们观察社会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要求人们不能仅仅从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来看待历史,更重要的是,必须从自然科学观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发展。这里的核心在于,人类是使自己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和它的继续,还是要成为它肌体上的一个特殊癌肿?人类是应该履行大自然赋予的使命,还是继续让大自然适应自己独特理解的需要,并把这种需要视之为进步,更深地陷入同大自然的冲突之中?这一问题的答案,决定着人类是继续无秩序地积累着他们与自然和社会的灾难信息,还是以更有前途的文明发展轨迹向前发展。当人类的行为圈逐步接近持续圈边缘的时候,解决危机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技术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通过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使得人类可用的持续圈扩大。缓解人类行为圈与持续圈的矛盾。然而,技术的创新、创造、发明有自己的规律,它的发展速度很难预测,有时也受自然资源的约束。比如,某种生态物种的灭绝,便会使利用此种生物制造有关药品的可能性消失,使这方面的技术创新受到限制。而且,一项技术从产生到实施应用,也往往会遇到许多制度上的障碍和人为限制,如环境保护技术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传播便会遇到一定阻碍,而这项技术是否会在工厂使用,又常常会受到工厂经济利益的制约。所以,单靠技术解决办法,很难真正奏效。另一种办法可称之为非技术解决办法。是指在人类可用持续圈不变的情况下,如何创立一些制度、法规、条约等来限制人类行为圈的增长,以避免人类行为圈靠近、重合或突破其持续圈。与技术解决方法一样,非技术解决方法也在解决人类社会的持续圈扩大,也还需要非技术解决方法来限制人类行为圈的增长速度,并保证技术解决方法得以实施和贯彻。而当这两类方法都无法奏效时,人类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危机便会转化为人类灾难。<sup>[7]</sup>

三、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国情与现代化的唯一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道路,并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此期间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往往偏重于以经济总量为主的观念。<sup>[8]</sup>从“一·五”到“五·五”,5个5年计划都称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六·五”计划时期以前的5个5

年计划采用的指标是“社会总产值”，也称“社会总产品”。它反映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物质生产发展的总成果，通常包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5个部门总产值的总和。<sup>[9]</sup>“六·五”计划开始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并提。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同时，也制定了包括人口、劳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内容的社会发展计划。社会发展作为5年计划的独立组成部分，表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是指以精神生产、信息交流、社会服务和某种物质生产等一系列活动内容和形式来满足大众需要的一种社会变迁。其主要内容包括自然环境、人口、婚姻、家庭、就业、劳动力资源和劳动条件，居民收入与消费、住房与生活服务、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体育、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社会心态、社会活动的参与情况等许多方面。<sup>[10]</sup>在此期间，社会发展的内容逐渐丰富，范围不断扩大。先是有“十大领域”说。这就是：环境、人口、经济、居民生活、劳动、社会保障、卫生保健、科技教育、文化教育、社会秩序。再就是“十三大类”说。这就是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所制定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包括13个方面：自然环境、人口与家庭、劳动、居民收入与消费、劳动保险与社会福利、住房与生活服务、文化与体育、生活时间分配、社会秩序与安全、政治活动与社会参与情况。稍后，国务院领导在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十四大类。这就是：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科学教育事业、社会保障事业、缩减贫困、就业与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卫生保健事业、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育娱乐事业、城乡公共设施建设、社会参与和社区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公共安全与预防犯罪、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等社会群体的保护。从社会发展内容和三次变化，除了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发展的内容越变越具体、丰富以外，还可以看出“十大领域”说不含政治参与，后来补充进去了。再就是“缩减贫困”的问题后来也提出来了。更主要的是越来越接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决定了各项工作都应着眼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

平、道德修养、身心健康。“七·五”计划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体系。它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改变了精神生产即脑力劳动和各种服务性质的劳动不创造社会价值的误区。这个转变至“八·五”计划时更为明显。但国民生产总值也并不能全面显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sup>[11]</sup>它体现的主要是经济活动成果，因而不断遭到批评。经过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洗礼，许多国家都增加了理性思考，开始由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向寻求经济、社会、环境、技术、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倡导发展的协调性、综合性和持续性。这种发展观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想，成为全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课题。即使是在第三世界后进的现代化国家中，也越来越引起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sup>[12]</sup>第三世界中有的国家，仅就人均GNP而论虽名列世界前茅（1993年科威特2335万美元，排第10位；阿联酋2247万美元，排第12位），但仍然不属于现代化国家，这就说明GNP并不是衡量现代化的唯一标准。据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介绍，韩国政府在60年代的政策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70年代让位于“增长第一”，80年代调整为“公平中求增长”，近年又进一步调整为“提高生活质量而实现增长”。同样，正确对待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课题。<sup>[13]</sup>

“九·五”计划以跨世纪眼光，把发展提到战略高度，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战略主导地位。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国情有机结合并付诸实践。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保证社会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走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对中国发展历程重新审视，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一，它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唯一选择。第二，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第三，它是谋求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保证。第四，它有助于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产生。<sup>[14]</sup>（参考文献见第42页）

加人力投资,开发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消除失业,而且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最后,将促进再就业预备制度的建立,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而加快。劳动者如果只有单一的劳动技能,将无法适应经济结构变化的需要。

现在问题在于,由于我国目前的人力就业培训制度不够完善,它客观上制约了人力政策功能的发挥。表现在:(1)缺乏完善的就业培训信息网络,导致培训需求与培训供给脱节。(2)培训教育投资相对不足,就业培训范围受到限制。(3)单纯突出学历、追求文凭的倾向没有消除,失去了培训为就业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标。(4)就业培训基地建设滞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大学以及相关高等院校在劳动就业培训上未能形成有效的“合力”。为此,目前应着重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强化就业培训有关法规的贯彻,推动人力培训制度的建设。中共中央曾在1985年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了就业培训工作的重要性,确定了“先培训、后就业”的指导原则,提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应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结合起来。我国颁布的《劳动法》、《职业教育法》也明确指出:“国家实行劳动者就业前和上岗前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的制度”。但目前贯彻力度不够,易于操

作的规则也不足。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第二,加强培训机构与企业、劳工部门合作,促进就业培训基地的建设。我国现有技工学校4500多所,就业训练中心2700多个。它们可以作为实施人力政策的基础力量。如果各级政府能给以政策乃至资金的扶持,建设好培训基地,它们在实施再就业工程中的作用就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第三,开辟培训资金的筹措渠道,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扩大职业培训范围。除国家专项投入外,可以考虑从失业保险金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就业培训资金。

第四,建立完备的就业培训信息网络,提高就业培训效率。通过加强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努力缩短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过程。

第五,转变传统行政指令为导向的就业培训机制,使之向以劳动力市场需求转变。即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号,调节和引导职业培训与技能开发,使培训活动将不再单纯追求文凭,而更注重生产技能的提高。

#### 参考文献:

- 1 庇古.论失业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12
- 2.3 托宾.通货膨胀与失业.见:现代国外经济学文选.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85

(上接第33页)

#### 参考文献:

- 1 李晓东.可持续发展思想概述.国土开发与整治,1995,20(6):21
- 2 夏光.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国情国力,1994 16(6):70
- 3 柳树滋.大自然观.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5
- 4 雷珀特(德).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经济学译丛,1987,13(1):121
- 5 夏甄陶,周穗明.智力圈时代人与自然系统的发展及规律.学术研究,1986,11(3):130
- 6 沙尔茨曼(美).美国绿色运动.第四世界评论,1989,(33)
- 7 李晓帆.建立新时代的资源经济观.现代化,1990,15

(9):81

- 8 张小平,王明珠.社会主义社会协调机制与改革.江西社会科学,1985,7(5):66
- 9 严立贤.发展理论与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1988,20(5):140
- 10 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23
- 11 杨开忠.中国区域发展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189
- 12 陆大道.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67
- 13 盛斌,冯仑.中国国情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275
- 14 刘铮.人口现代化与优先发展教育.人口研究,1992,15(2):29